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

王立新黎跃进主编

外国文学史

(东方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

(东方卷)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

王立新 黎跃进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史. 东方卷 / 王立新, 黎跃进主编;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04-037891-7

I. ①外… II. ①王… ②黎… ③教…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5403号

策划编辑 刘新英 责任编辑 赵慷简

书籍设计 张申申

责任校对 杨雪莲 责任印制 韩 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9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8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7891-00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兼顾学科系统性与教学实际需要，将东方文学按时代分成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和当代五章，每章的概述宏观概括文学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特点，勾勒文学发展线索和主要成就，总结发展演变规律；其他专节选取各时代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述与分析。本卷对同类教材有所忽略、但在文学史上确实重要的作家作品予以关注，如上古的《阿维斯塔》，中古的崔致远、穆太奈比，现代的哈基姆，当代的纳拉扬、奥兹等。对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中长期以来厚古薄今的局面有所突破。

编 委 会 名 单

名誉主任 刘中树 曾繁仁

主 任 陈 洪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立新 乔以钢 刘中树 朱庆之

张福贵 杨慧林 沈 阳 陈 炎 陈 洪

周 宪 尚永亮 於可训 贺 阳 崔希亮

曹顺庆 黄德宽 曾繁仁 蒋述卓

《外国文学史》(东方卷)编委会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序)

编 委: 金长善 黎跃进 林丰民 卢铁澎
王立新 魏丽明 张晓希 钟志清

本卷撰稿人(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序)

高文惠(德州学院中文系)

金长善(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劳凌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语学院)

黎跃进(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林丰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刘雨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卢铁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马 征(河南大学文学院)

孙 霄(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谭艳红(华侨大学文学院)

王春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立群(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王立新(南开大学文学院)

王新新(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曾 琼(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张晓希(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钟志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中国高等教育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15%,迈入大众化教育的门槛,至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由以规模扩大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逐步转向以提高质量、注重内涵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本科阶段,素质养成、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教育,所占分量越来越大,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教育则很大程度向研究生阶段转移。这一发展趋势,对高等教育教学无论在理念、目标层面,抑或在内容、教法层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之学术发展、学生阅读和学习习惯改变,信息和网络技术加速融入、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生活各方面等因素,更彰显出高等教育本科教材与新的教学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

— 本世纪初,为了更好应对高等教育将要发生的诸多变化,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确定了新的教材编写设想,并通过专题会议等形式进行多次研讨。经过研讨,专家们认为,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信息化时代,高校本科阶段的办学规格、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较以往有较大转变的背景下,由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牵头,组织编写立足于新时期学生特点、纸质内容与数字资源高度集成的中文学科教材,非常必要;应该在密切跟踪、深入调查研究高校中文学科教育教学变化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每门课程教材的编写理念和方案。现在,经过大家共同努力,这些教材编写设想陆续有了成果,并在以下几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特色:

1. 简明扼要。在新的形势下,中文学科本科基础课大都缩减了课时,尤其是地方院校,基础课的课时量往往缩减到原来的一半甚至更少。为适应这一教学情况的变化,新编教材首先在容量上进行了精简。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往的教材通常由三到四册组成,而我们将其精简至两册;《古代汉语》通常由两册或更多组成,我们精简至一册。容量的压缩不是简单地做减法,而是尽量浓缩精华,将学习的重点、难点简明扼要地展现在教材中,使学生一目了然;在不必要做过多阐释的地方,仅用一两句话加以说明,从而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学生思考,也便于授课教师的个性发挥。

2. 注重实用。新编教材在内容上努力降低理论重心,以实用的知识点传授为主。如《古代汉语》教材打破过去“通论一文选”二分的教学模式,围绕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来进行设置,强调回归古书原典的阅读情境,将传统的通论“化整为零”放在随文注释之中,让学生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习得。同时,为了实现“学生

好学，老师易教”的总体追求，我们精心设计了功能栏目与书稿正文内容相配合的体例框架。教材中各栏目的插入并非徒有其表，而是服务于特定的教学目的。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在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种文体出现时，设一专栏将该种文体之来龙去脉加以简要介绍，这样既可强化学生的文体意识，使学生对前后交叠出现的文体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可以把握，又便于正文专力进行作家作品的评析，保持清通流畅的文气。

3. 增强趣味。在纸质教材的编写中，我们十分注重行文的简洁明快，避免使用较为艰涩和学术化的表达；一些篇章不乏灵动有文采之处，切实增强了可读性。同时，精心选择与教材内容关联密切的各类图片插入书稿相应位置，既对学生理解掌握相关内容有所裨益，又增强了整套教材的书香氛围和艺术气息。在数字化资源的建设中，智能备课系统有意收入了许多逸闻趣事类的拓展资源，而多媒体手段的合理穿插，对课程的趣味性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4. 体现创新。新编教材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方面。与以往教材主要为“教”服务不同，我们努力将着眼点转向“学”，从开启学生心智、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出发，增强教学互动性，将学生参与的可能性体现在教材中。比如《现代汉语》设计了两条线索，语音、语法、语义等传统内容是主线，整书主体由此有序展开；另一条线索是成体系、起辅助作用的教学提示板块，它使得学习难点与重点突出。两条线索相辅相成，更适合课堂教与学的需要。而对于内容方面的创新则是较为谨慎。在传授稳妥可靠的专业知识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教学与科研的发展，适当增加具有前沿性和拓展性的内容，以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充分利用近年来考古获得的可靠的新成果，以出土文献及文物资料来丰富文学史的书写，为使学生更为全面地了解文学史尤其是汉以前的文学史做出了新的努力。

5. 立体组合。数字化手段与传统教学相结合，是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面对新时代具有新的学习和阅读习惯的大学生，在教育主管部门强力推动下，高校数字化教学改革的全面铺开将是未来若干年必然出现的景象。近年来，许多学校已先行一步，进行数字化教改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教材出版也正在经历一场数字化的洗礼。在这方面，高等教育出版社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了积极的探索，他们的数字出版经验与教材编写者多年来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相结合，形成教材立体化建设的深厚基础。注重纸质教材、数字化资源和教学服务的整体设计，是新编教材从一开始就明确下来的途径。也即是说，并不是先建设纸质教材，而后再配套进行数字化资源的建设，而是在编写纸质教材的过程中，编写者就已同期开始对数字化资源的构思。例如几种文学史类教材在编写时，受篇幅和主要读者对象的限制，许多知识点不宜在文学史中表现出来，就考虑放入智能备课

系统中；同时，一些经典篇目如果在作品选中已收录，其赏析文字就可以侧重体现于作品选而不是文学史中。通过这样的合理分工，相互配合，使教学的延伸性、拓展性得到有效的实现。可以说，新编教材在立体化、整体化程度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勾连呼应方面，实现了质的突破。

新编教材涵盖了中文学科8门专业基础课程(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写作)。此外，一些比较重要的专业选修课程教材也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教材的主编人员均为国内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同时也非常重视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尽管日常教学、科研等工作极为繁忙，但基于对教材改革重要意义的共识以及教书育人的强烈责任感，所有参编者对教材编写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编写过程中，除了按照统一分工负责各自主持的教材编写工作外，各位主编还以多种方式进行沟通交流，相互启发。在此，谨向所有编写人员以及为教材顺利出版付出努力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道路还很长，我们希望通过新编教材的出版，为推动中文学科教学改革助一臂之力。对于教材当中存在的不尽完善之处，恳请读者在阅读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3年元月

《外国文学史》(“西方卷”与“东方卷”),是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部署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重点教材之一,南开大学文学院王立新教授受邀担任主编。2010年1月6日,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函请该系列教材的主编们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位主编分别与出版社签订合同,这项工作正式启动。

接受《外国文学史》主编任务后,王立新同志首先写出了《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体例、规范和撰写要求》,同时开始在各高校和科研单位中联系、聘请编委。两卷教材工作量巨大,且交稿时间又有严格的限制,在征得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意后,王立新同志特别邀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学院的黎跃进教授具体负责“东方卷”的编写工作。2010年7月9日至11日,由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在天津红楼宾馆举行,两卷教材的编委和部分作者、高教社编辑云慧霞同志参加了会议,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乔以钢教授到会祝贺。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了王立新和黎跃进同志分别草拟的“西方卷”和“东方卷”教材章节的大纲,并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修改,最终确定了两卷教材的章节内容。会后,王立新、黎跃进同志又分别撰写了样稿,与商定的教材大纲和《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体例、规范和撰写要求》一并发给各位编委,由编委们再发给各位作者,教材开始进入实质性编写阶段。特别要说明的是,在编写工作开展后,王立新同志除负责两卷教材的进度,并就编写工作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保持与教指委和出版社的密切沟通外,其精力主要放在“西方卷”的编写和修改上,“东方卷”的具体主编工作是由黎跃进同志负责的。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两部教材历时一年有余完成了初稿。王立新同志对“西方卷”、黎跃进同志对“东方卷”的初稿分别进行了审读,提出了修改意见,又将稿件发回给各位作者进行程度不同的修改。接到第二稿后,王立新、黎跃进同志分别对两卷教材再次予以修改,并进行了统稿。随后,根据出版社对教材审读后的建议,两卷主编第三次进行统稿和修改。最后,王立新同志根据出版社第二次审读意见对《外国文学史》两卷的内容进行了最终的通读、审校,编写工作方告完成。

这部两卷本的《外国文学史》是编写者们通力合作的成果。在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各位学者、教师们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及时完成自己负责撰写的章节并根据主编的意见修改自己的稿件。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陈洪教授始终关心本套教材的进展,并就教材的编写形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高

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社长迟宝东，编辑云慧霞、刘新英在编写过程中数十次与主编就相关问题予以沟通和协商。在此，我们对上述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外国文学教材的编写殊非易事，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学界同仁和广大师生的批评指正。

主 编

2013年3月3日

.....	导 论	1
-------	-----	---

.....	第一章 上古东方文学	15
	第一节 概 述	16
	第二节 《亡 灵 书》	36
	第三节 《吉尔伽美什》	42
	第四节 《塔 纳 赫》	48
	第五节 印度两大史诗	56
	第六节 《阿 维 斯 塔》	66

.....	第二章 中古东方文学	75
	第一节 概 述	76
	第二节 《万 叶 集》	98
	第三节 紫 式 部	106
	第四节 崔 致 远	114
	第五节 阮 攸	119
	第六节 迦 梨 陀 娑	123
	第七节 萨 迪	130
	第八节 穆 太 奈 比	137
	第九节 《一千零一夜》	143

.....	第三章 近代东方文学	151
	第一节 概 述	152
	第二节 夏 目 漱 石	166
	第三节 芥川龙之介	173

第四节	黎 萨 尔	180
第五节	泰 戈 尔	185
第六节	纪 伯 伦	194

.....	第四章	现代东方文学	203
	第一节	概 述	204
	第二节	川 端 康 成	214
	第三节	李 箕 永	222
	第四节	普列姆昌德	227
	第五节	西 巫 拉 帕	234
	第六节	赫 达 亚 特	239
	第七节	哈 基 姆	247
	第八节	阿 格 农	254
	第九节	桑 戈 尔	261

.....	第五章	当代东方文学	269
	第一节	概 述	270
	第二节	大江健三郎	287
	第三节	纳 拉 扬	294
	第四节	普拉姆迪亚	301
	第五节	马 哈 福 兹	307
	第六节	奥 兹	314
	第七节	戈 迪 默	320
	第八节	索 因 卡	327
	第九节	库 切	334

.....	后 记	343
-------	-----	-----

文化是文学的母胎，什么样的文化孕育什么样的文学。文学又是文化的“缩影”，素有“小文化”之称。东方文学蕴含着东方精神、东方智慧和东方情操，更是东方审美体系的符号。

一、几个基本概念

“东方”是一个有着多种内涵，具有一定模糊性又广泛使用的概念。它至少有下列几种含义：

第一，方位概念。讲方位就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以中国为立足点，中国的东面称为东方，中国的西面称为西方，因而，中国人长期把印度当作西方。唐代高僧玄奘从凉州出玉门关赴天竺，被称为“西天取经”，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名之《西游记》。

第二，地理学概念。按照国际的地理疆域规定，以西经 20° 和东经 120° 的经线圈，把地球分为东、西两个半球，这样，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都属于东方范围。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不在东方圈内，又把欧洲的原苏联、东欧部分国家包括进来，大洋洲也属东方。

第三，政治学概念。20世纪国际政治关系演变，“东方”、“西方”又具有政治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时期形成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属于西方，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属于东方，因而，地处亚洲的日本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成员。

第四，历史文化概念。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亚述人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亚细”（意为日出之地），古代希腊罗马人把地中海东岸地区称为“亚细亚”，还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历史文化概念的东方指除了古希腊罗马之外的几大古代文明发源地，因而包括亚洲和非洲北部地区。

本书讲的“东方”，是指亚洲和非洲。它综合上述历史文化概念和地理学概念的“东方”，外延又有所拓展。

东方文学研究属于“东方学”的一部分。尽管东方各国从古到今都对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学有着各自丰富的研究传统，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东方文学”，是随着“东方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和“东方学”的发展而逐渐确立并发展的。“东方学”的

范围包括研究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各种文化形态：传统的、现实的，精神的、物质的以及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东方社会进程的规律等。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体。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艺术、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经济等分支学科；从区域研究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突厥学、日本学、伊朗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朝鲜学、中东学、敦煌学等分支学科。

“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文学、艺术、语言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萌芽于16世纪，确立于19世纪，而其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已有对埃及、巴比伦和古波斯的描述。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把东方描写成仙境福地，激起西方航海家探寻东方的热情。之后随着西方向东方的扩张，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东方，他们编写了关于东方文化习俗的著作。16世纪末的巴黎大学，17世纪的牛津大学开设了近东语言讲座。17世纪末，欧洲的东方学家收集了大量东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写的系统性著作。18世纪，欧洲人的东方语言研究获得发展，不但开始了对东方语言的比较研究，而且出版发行了一批重要的东方经典的高质量译本，如中国的《易经》、阿拉伯的《古兰经》、波斯的古经《阿维斯塔》、印度古老的《摩奴法典》等。

到了19世纪，东方学在众多方面获得突破和发展。首先是东方古代文字的破译和一系列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古代文献。曾在古代两河流域长期使用的楔形文字、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被释读成功，大量泥版、碑刻、铭文、石刻文献的发现，为世人打开了古代地中海文化圈灿烂的文明宝库。其次是随着西方学界对东方语言研究的成熟，一批大型东方语言工具书和自成系统的语法著作出版，如《英华字典》（6卷，马礼逊著，1828）、《梵文字典》（7卷，波特林格等著，1863—1894）、《中俄大辞典》（帕雷底阿斯编，1888）、《梵文文法》（基尔荷恩，1888）、《汉文典》（甲柏连，1881）等。再次，不但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在这一世纪中成绩卓著，而且具有影响力的东方学研究组织开始纷纷建立。1873年东方学家齐集巴黎举行了第一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以后每隔3至4年举行一次。这些都标志着东方学的确立。

东方学研究在20世纪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以其在语言、

材料等诸方面的优势异军突起，带来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民族文化视野和价值立场。这一时期西方的东方学也更加深入，趋向客观，许多大学都设有东方学系或东方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期刊。一些研究领域非常繁荣，如敦煌学研究不到百年，却成为国际显学；汉学、日本学、中东学也因20世纪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而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研究分支。

400余年的东方学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东方学学科缺少统摄各分支学科的宏观理论，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二，由于东方学产生于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后向东方的扩张、殖民过程中，迄今不能完全消除其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或色彩。美国当代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曾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又译《东方学》）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西方对东方的描述，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艺作品，都存在严重的扭曲；西方人把东方当作异己的“非我”，构造出一个自己需要的、文化价值低于西方的东方形象。我国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习来已久的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神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1）}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也指出，西方的东方学是“一种由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作的社会构造，现在正是这种构造的有效性受到抨击，抨击在三个方面：（1）这些概念不符合经验事实；（2）它们过于抽象，因此消除了经验世界的多样性；（3）它们是带有欧洲人偏见的产物”。他还说：“东方主义确立了欧洲占支配地位的权利的合法性，它



爱德华·沃勒·萨义德

（1）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在为欧洲帝国主义在现代世界体系内的作用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中，确实起着一种主要的作用。”⁽¹⁾

更为严重的是，数百年来东方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描述和研究东方的话语体系，即使来自东方文化系统内的东方学者，也难以摆脱已有话语体系的束缚。当然，对东方学已有的成果不能一概否定，几百年里几代学者的努力，并非都心怀偏见，有的出于超功利的个人爱好，有的出于对真理的执著，能够对东方进行客观、公允的研究与评价。但不管怎样，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还需要更为切实、深入，尤其是东方学者，更是任重道远。

“东方文学”研究形成于20世纪初期。“东方文学”作为东方学的分支学科，研究亚洲、非洲的文学现象及其规律。在经过18、19世纪主要发掘整理材料和对东方古文字释读的阶段后，20世纪初葛鲁贝的《中国文学史》(1902)、温德尼兹的《印度文学史》(1909—1920)、汉密尔顿·吉布的《阿拉伯文学史》(1926)和俄国学者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东方文学专著出版，标志着东方文学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学科。

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谢六逸对日本文学的研究，许地山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成绩显著，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对东方文学作了较多篇幅的论述。但这些还只是停留于国别文学的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亚非作家会议召开的背景下，我国对作为整体的东方文学的把握和研究提上了学界日程，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在当时开设了东方文学课程，一批开拓者开始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开始东方文学体系的建构，但刚刚起步就因遭遇“文革”而中断。80年代初，中国的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重整旗鼓，东方文学列入了高校教学大纲，一批著作和教材出版，全国性的东方文学师资培训班也得以举办。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方文学研究更是发展迅速，成果斐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中国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研究东方文学，本国文学不列入具体的研究对象；不过在对东方文学进行总体论述和评估时，仍必须把中国文学成就纳入视野之内。

二、东方文学的深层文化特质

东方包括众多民族和国家，各自都有灿烂的历史文明，东方文化是否具有内在

(1) 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7年第2期。